



抗战时期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研究*

杜桂剑 单明明

内容提要 从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西进始,到1945年10月淮北二分区调整为华中八分区的一年多时间中,淮北二分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是据点式减租减息阶段。第二阶段,从1945年6月到10月是较普遍减租减息阶段。对抗战时期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的考察,可见中共减租减息政策提出和执行并不完全同步,而存在时间差。佃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是否积极,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不是其认识问题,而是中共力量是否强大及政权是否稳定。

关键词 减租减息 淮北二分区 淮北二地委 淮北区党委

对淮北二分区^①(以下简称为“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在已有论著中多是简要述及中共淮北二地委(以下简称“二地委”)的几个文件和减租减息的成效^②,或是将其放在论述华中、淮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时有所涉及^③,或是在根据地通史研究中一笔带过。^④

学界有关中共中央层面以及较大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研究论著成果丰硕^⑤,但对于小区域

* 一般来说减租减息运动是一体的,但考察淮北二分区的情况,更多地是减租,减息没有多少开展。有调查显示:1945年前“法币跌价,情况变化,有钱人不愿放账”。参阅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31页。鉴于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以减租为主,因此行文中使用的“减租减息”概念,主要是指减租,较少涉及减息。

① 二分区,地处江淮平原。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至陇海路,南到涡河,辖萧县、永城、宿西、夏邑、永商亳(后改称为“雷商亳”)、永涡、宿怀、宿蒙等,人口250万。参阅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豫皖苏边区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② 参阅杨成文、李克影《略述淮北二地委的减租减息运动》,《党史纵览》2000年第3期。

③ 参阅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朱超南:《淮北苏皖边区减租减息斗争述论》,《安徽史学》1987年第2期;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④ 参阅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豫皖苏边区革命史》,第227页。

⑤ 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215页;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303页;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91页;董志凯、陈廷焯:《土地改革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0页;王启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李永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减租减息运动的研究意义仍然存在。与陕甘宁、晋察冀等华北抗日根据地不同,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是在较动荡的环境中进行的,且正式开始的时间比较晚(1944年12月以后)。^①此外,较淮北苏皖边区(即淮北抗日根据地)其他地区而言,正因为开始时间晚,且在较为动荡的环境中进行,二分区似没有进行减租减息复查就开始了土改。^②

二分区在1939年到1941年初曾是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宽广肥沃,农产品以小麦、高粱、小米、棉花为主,每年出产供给本区需要,大约剩三分之一”。^③在此期间,中共曾提出减租减息的政策、口号,并开展过减租减息试点,但主要停留在政策宣传和零星试点阶段。^④1941年初,在豫皖苏边区国共冲突中,中共力量被迫撤到津浦路东,该地区沦为游击区。

1944年初,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溃退,豫皖苏边区出现了真空。此时,中共中央和华中局以及新四军军部决定四师挺进津浦路西。8月15日,四师在半城誓师西进,不久,“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得以全面恢复”。^⑤12月11—17日,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以下简称为“淮北区党委”)^⑥在蒙城北马圩子召开津浦路西工作会议,正式成立隶属于淮北区党委、行署、军区的二地委、二专署、二军分区。吴芝圃任地委书记,彭笑千任专员,张震兼任二分区司令员。^⑦

揆诸史实,根据二分区减租减息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政策层面),其减租减息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据点式减租减息阶段(1944年8月—1945年5月);第二阶段,较普遍减租减息阶段(1945年6月—1945年10月)。

一、淮北二分区据点式减租减息

新四军四师在1944年向津浦路西进军途中,就通过告示、布告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号召。1944年8月23日,四师在《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中提出,他们在豫皖苏区将干四件大事,其中包括“要求地主减租减息,要求佃户交租交息”。^⑧同月,新四军四师司令部与政治部联合发出布告,号召:“农民努力生产,田租利息减轻”,布告也提出保障地主的一些权益,如“地主收租放债,

① 有学者认为:“抗战初期,减租减息还只是停留在宣传号召阶段”,“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就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夏季以后,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参阅董志凯、陈廷焯《土地改革史话》,第54、61页。

② 根据华中八地委宣传部部长江枫对雪枫县苗桥区的调查,即使是雪枫县“老区之一”的苗桥区,其所辖的“基础和工作较好的”苗桥乡,1945年因受扩军影响,“秋季减租,还未发动”。参阅江枫《苗桥乡调查》(1945年11月28日),《淮北农村调查》(内部发行),豫皖苏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213、209页。即使到1946年5月,淮北二分区已调整为华中八分区,华中八地委仍是要求夏季在边区“全国〔面〕的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接着开展反奸和清算运动”。参阅《八地委夏季群众工作会议决议》(1946年5月28日),《夏邑县党史文献资料选编 民主革命时期》,出版信息不详,第148—149页。

③ 《彭雪枫关于豫皖苏边区财政经济状况报中共中央电》(1940年2月26日),中共商丘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④ 参阅刘瑞龙《东进,东进,再东进——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淮北敌后》,《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豫皖苏鲁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1982年编印,第19—20页;彭雪枫:《目前时局与目前任务》(1940年2月17日),《彭雪枫文集》编委会:《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139页。

⑤ 《豫皖苏边区革命史》,第225页。

⑥ 1941年8月23日,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主力挺进津浦路西,原豫皖苏区很快得到恢复,由于地域扩大到河南省,所以中共淮北苏皖豫区党委一般仍简称为“淮北区党委”。参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⑦ 参阅《中共淮北区党委关于三个分区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的通知》(1944年12月17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891页。

⑧ 《新四军第四师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1944年8月23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737页。

保其应得权益”。^①

1944年12月7日,淮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路西群众工作的指示》。

首先,关于减租减息在二分区工作中的地位。指示说:“只强调合理负担,而不加强减租减息,这是不对的”,发动群众斗争“纲领的中心是减租减息增资”。^②

其次,对二分区减租减息的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要点如下:1. 减租率。“仍以实行二五减租原则为宜,具体口号即是淮北土地租佃条例所定的对半改三五、六五分租”。2. 二分区减租时间“一律从今秋季减起”。^③

为贯彻淮北区党委的指示,1944年12月11—18日,二地委在蒙城县北马圩子村召开二分区群众工作会议。

会议确定“把群众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工作中,“开展以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为中心的斗争”。较淮北区党委,二地委把减租减息增资的地位提升了一步,明确减租减息增资工作是二分区工作中心的中心,同时规定:“‘双减’的原则是从原地租中减去25%。”^④

二分区所辖涡永县的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是减租减息运动开展较早的地方,其减租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集体减租。

首先,召开佃户大会,商量减谁的。在本集保因为牛雪峰佃户最多,其妻已准备减租,决定“先减牛雪峰的租”。在四里保其他地主“都在观望牛宝坤,牛宝坤能减,大家都照减”,决定“先减牛宝坤的租”。

其次,针对佃户对减租没有信心以及地主敷衍的情况,工作队动员积极分子,抓住典型减租。当时曹市乡四里保、本集保的佃户对减租没有信心,多有疑虑。不仅如此,地主亦对减租敷衍。针对这种情况,工作队动员积极分子,抓住典型来减租。“保证要将牛雪峰、牛宝坤的租减好”。但结果是牛雪峰减了租,牛宝坤由于没有粮食并没有被减租。^⑤

(二)小组减租。小组减租一般是在集体减租之后,具体步骤如下^⑥:

第一步,在工作队领导下,把自然村分为减租小组。一般把“一个村或二三个村编成减租小组,每小组七八户到十户不等”。

第二步,动员宣传,小组制定减租的具体对策。宣传动员上,“宣传牛雪峰减租胜利的消息”,具体对策上,“大家商讨减租办法,先减谁的?怎么减?谁带头?谁讲话?”等细节问题。

第三步,小组长带领佃户减租。这个阶段一般工作队不参加,但要派人来回联络,掌握具体

^①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44年8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741页。

^② 《淮北苏皖豫边区党委关于开展路西群众工作的指示》(1944年12月7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11—112页。

^③ 《淮北苏皖豫边区党委关于开展路西群众工作的指示》(1944年12月7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13页。

^④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⑤ 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37—138页。

^⑥ 具体步骤相关内容均参阅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38页。



情况。

到1945年初,曹市乡的减租结果主要有三种情形^①:

第一种,切实减租。这个时候能做到切实减租主要是因为:一是佃户比较团结对减租要求强烈。一般,佃户们“几个小组约好一齐来,一齐走,一齐把粮扛回去”,对地主,佃户们“逼的紧”;二是这些地主本身无实力。他们“势力不大,或者无势力的中小地主”;三是工作队给农民撑腰。工作队虽然没有参加直接斗争(有的除外),但工作队“查的紧”。正是在这三种合力的作用下,这些地主才切实地减了租。

第二种,打折扣减租。在曹市乡本集保、四里保,打折扣减租具体做法有:1. 地主和佃户商量,少报粮食产量,少退租。2. 大斗收租,小斗退租。3. 算主粮不算副粮。4. 哭穷欺骗佃户拖延减租。

造成妥协减租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部分佃户有顾虑,打不开人情面子。二是这些地主并不愿意减租,是在政府、工作队的压力下的结果。

第三种,恐吓并拒绝减租。恐吓并拒绝减租的是顽固地主,一般是采取恐吓佃户,贬损减租政策的方式,达到不减租的目的。在恐吓佃户方面,地主牛宝坤说:“吃下去好吃,看你怎么屙”,“新四军游来游去,你们跟着他游吗?”在贬损减租政策上,地主牛宝坤说:“新四军真毒,先把咋弄穷,再把你们弄光”。

在这种情况下,佃户有疑虑和害怕情绪。有农民就担心说:“谁个不知道粮食是好的,但谁个不要头呢。”

针对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减租不彻底的情况,工作在淮北区民运部部长赵敏的带领下,用了10多天时间,发动了二次减租。具体做法如下^②:

第一步,工作队下到两保,进行充分的调查准备工作。

首先,确定减租对象,重点突破。最后工作队确定减租对象是四里保的牛宝坤和本集保的牛一鹏。这些材料的取得,主要是通过召开佃户大会。

其次,发动佃户中的积极分子和与地主有矛盾的佃户。工作队对两个地主的地主佃户说服半天,没有头绪,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选择积极分子以及和地主有矛盾的佃户组成说理小组(即斗争小组)。

再次,召开农民代表与佃户小组会议,为说理大会准备。会议通过了以下几条决议:1. 大家一条心,不抱粗腿,坚决帮助佃户减租。2. 不随便离开会场。3. 保持秩序。

最后,进行说理大会会前布置。会议的“名义是东佃代表会议,乡长做主席,分头通知地主开会,通知保甲长协助动员佃户及农民开会(主要由各佃户小组分头通知)”。在休息场所,把地主和佃户分开,以示区分。“会场布置了地主休息的地方,由乡公所负责,佃户农民休息的地方,由区农救会负责”,另外找一个适当的会场,一般会场布置在农教会。

第二步,召开说理大会,斗争地主。

在两保的说理大会上,佃户发言,多是揭露地主不道德的事情。

这次说理大会提高了农民的斗争情绪,打击了地主的威信,“形成一个退租的热潮”。

^① 相关情形内容均参阅赵敏《涡阳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38—139页。

^② 以下内容出自赵敏《涡阳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42—146页。

第三步,说理大会后,组织佃户和农民召开会议,巩固斗争效果。

首先,对在说理大会中谄媚地主的人,不让其参会,同时表扬在说理大会中的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宣布农救会组织办法,要大家组织农救会”^①,并调整减租小组长人选。

雪商亳县是恢复二分区时在雪枫县(即永城县)、商丘县、亳县三个县交界处建立的边区县。1945年2月,雪商亳县开展减租减息,具体规定:减租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包租制。“实行二五减租,并根据年景好坏,满收满交,半收半交,不收不交”;第二种,分租制。“过去对半的改为三五、六五分,四六分的改为三七分;游击区实行一成五到二成减租”。^②

雪商亳县从试点开始,推广经验,以点带面进行减租。

第一步,雪商亳县县委书记丁希凌、组织部部长殷效舜带领工作队,到马头寺搞减租的试点工作,取得减租的经验。^③ 主要做法如下:

首先,走访调查,确定减租对象和其他基本情况。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群众生活和地主剥削穷人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工作队经过10多天调查,发现马头寺没有一个佃户。^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1. 地主威胁佃户,强调新四军政权不能长久。2. 地主在情感和观念上笼络佃户。3. 群众有变天的顾虑。“当时雪、商、亳三县的结合部解放了,我们建立了政权,有新四军保护,但境内的酄城、龙岗、白庙集还有伪军据点,日本鬼子还占据着商丘、永城、亳县、夏邑,土顽冯凯勋、田中田、蒋心亮、祁炎勋等也不时进行骚扰破坏”,正是在这种“敌伪顽我”态势并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广大佃户对新四军政权是不是能够站住脚是有顾虑的。4. 广大佃户有很强烈的宿命论思想。雪商亳县雪四区区委书记柴凯回忆:“他们认识不到地主的剥削性,认为地主的财产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或是自己挣得的;而自己穷是命里注定,不是别人剥削的。”^⑤

针对马头寺“没有”佃户的情况,工作队队员再次深入群众,确定佃户。

在确定佃户方面,不再直接询问,正面了解,“而从侧面入手,用嘘寒问暖拉家常闲话的方式来了解情况”。^⑥ 在闲谈中,一般对方会放松警惕,会谈到谁是佃户和自身的一些情况,这样就比较容易确定谁是佃户了。

其次,确定佃户后,工作队“对已发现的佃户以集中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时事与阶级教育,白天进行个别教育,晚上在马头寺东头街南一户逃亡地主堂屋进行集中教育”。同时,召开贫雇农大会,启发农民觉悟。3月初,马头寺召开了第一次贫雇农大会。会上,雪商亳县组织部部长殷效舜、雪四区区委书记柴凯、商三区区委书记周铎作了长篇讲话。主要内容是:“当前形势;谁养活谁,谁应是天下的主人;地主和贫雇农谁的力量大,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等。”在这次会议后,每天晚上由工作队队员与老骨干,带着新发动的贫雇农去开会受教育。第二次会议时,重点研究成立村级的农救会问题,不久成立了马头寺农救会。^⑦

再次,1945年4月,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工作队选择对象,正式减租。“首先选择了一个有

^① 组织农救会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在说理斗争大会之前就成立了。参阅陈廷焯《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② 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8页。

^③ 参阅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殷效舜:《雪商亳县的开辟及经验教训》,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7、248页。

^④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7页。

^⑤ 柴凯:《对雪四区工作的回忆》,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51页。

^⑥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8页。

^⑦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8—309页。



200亩地的中等地主董先藻作为减租对象”。^①通过说理大会的斗争,参加减租斗争的30余户佃户,根据缴租的多少,得到了五六十斤不等的粮食,总共退回租粮2000余斤,大家喜气洋洋地把粮食扛回自己家里。^②

比较四里、本集两保和马头寺的减租试点,可以发现:其一,在减租前两地都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和细致的准备工作。其二,都是通过说理大会来达到减租的目的。

第二步,总结马头寺经验,向周边发展,以点带面地展开。

雪四区马头寺董楼村已成为雪商亳县减租和组织农会的典型。时任雪商亳县县委书记的“丁希凌还专[门]向地委作了汇报”。^③马头寺减租的经验主要有:1.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坚持讲政策和说理斗争。2.办法灵活,根据地主的态度,采取有力的对策。3.充分发挥群众的威力,让佃户多说话,防止工作队包办代替。^④同时,也组织减租、增资训练班,传播经验,训练减租干部。^⑤

马头寺减租试点后,“逐步向马头寺周围的董大庄、小董庄、董四口楼、杜园村及商三区的王楼乡、马庄乡扩展”。^⑥到1945年4月下旬,县委工作队除留少数人巩固试点成果外,大部分队员由殷效舜带领转移到商五区、亳二区开展“双减”工作”。^⑦

这一阶段,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各阶级阶层的心态大致如下:

佃户基本的心态可以概括为忧喜参半。其忧主要在于:1.怕中央军过来,新四军站不住脚。2.怕减租后要多负担公粮。3.怕地主抽租。4.怕减租伤了感情。正是由于这些担心和疑虑,“有些佃户推托不在家不参加会,有些说:‘咋掌柜的好说话,算多少退多少’”。另一方面,农民对于减租又很欢喜,愿意亲近中共。如在小郭庄,“一个农民说:‘你们是真心向我们穷人,我们也知道’。‘你们多查紧一下,大家就会把粮食报实在了’,‘谁不知道粮食是好的,大家都看人家’”。^⑧

包租制佃户和分租制佃户对减租的态度有所区别。“包租中代种地较多,车牛都有,对东家依赖性不大,减租积极”。分租制“佃户对老板依赖性大,有住处是老板的,有牛也是老板的,因此佃户对减租又顾虑”。^⑨

总之,这个阶段佃户在减租减息上是既害怕又想减的复杂心态。正如报告所说:“他们表现‘想减又不敢减’。又对我们敷衍,又想亲近我们,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力量,还不相信自己,他们希望政府工作队强迫一下,或者自己向地主让些步,自己不得罪人,把责任推在政府工作队身上,以达到妥协减租目的。”^⑩

积极分子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比较主动,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但对于新四军能不能坚持在这里的把握并不大。他们说:“如果新四军走,我就跟着它到洪泽湖去”,还有的认为:“反共军来了,我们

① 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9页。

②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9—310页。

③ 柴凯:《对雪四区工作的回忆》,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51页。

④ 参阅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10页。

⑤ 参阅王兴邦《亳二区斗争片段》,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90页。

⑥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6页。

⑦ 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9页。

⑧ 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39—140页。

⑨ 《淮北路西的群运现状》(1945年5月4日),中共商丘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53页。

⑩ 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40页。

大家把它打跑”，所以，吴芝圃认为积极分子“还未达到自己相信自己有办法有力量的程度”。^①

一般地主在这个时期对减租减息的心态是：一方面不甘心，很是抱怨，所以明里暗里反抗；另一方面害怕，所以合作。在言语抱怨方面，有的地主说：“宽大政策是一个套子”，“新四军是先甜后苦”，“组织农教会，土地（疑为‘地主’的误写——引者注）要受罪”。^②地主的反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拖延观望。这种主要是中小地主，他们本身的土地没有大地主多，一般把目光看向大地主。他们中“有些用感情拉拢，用拖延办法，使农民不好减租，有些中小地主又在观望大地主”。另一种，恐吓农民，拒绝减租。主要是有一定势力的顽固地主。他们“利用旧有威势恐吓欺骗农民，使农民不敢减租”。另一方面，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减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他们又害怕政府工作队查的紧，又怕农民真翻脸，因此‘想不减少减，又怕不减不妥当’”。^③同时，他们“感觉到政府的法令是不好公然违反的，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是难缠的”。^④

干部对减租减息的心态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支持佃户开展减租减息，另一种是觉得“减租减息是不凭良心”^⑤，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的剥削性。

二、淮北二分区较普遍减租减息

打破据点式减租减息，开展普遍减租减息，早在1945年3月二分区群众工作会议上吴芝圃就已提出，他说：“必须以普遍减租，即减的地区要补漏洞，未减的地区要广泛减。”^⑥但这个会议后，二分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普遍深入开展，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敌、伪、国民党顽固派、中共等力量共存，二分区环境动荡。

1944年12月二分区刚刚开辟，敌、伪、国民党顽固派三方对该区尚有威胁，中共工作重心很难转到减租减息上来。虽然二地委1944年12月工作会议曾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上来，但由于环境动荡，很难实行。1945年初，雪商亳县亳二区在芦庙小李庄、杨庄一带“提出的口号是‘边打边减’”，二分区环境动荡可见一斑。^⑦1945年5月20日，吴芝圃在总结前段时间二分区群众工作经验和教训时认为：群众运动没有普遍发动起来的原因之一是环境动荡，如夏邑、雪商亳县。^⑧

第二，佃户依赖性，等待观望不积极。

1945年5月20日，吴芝圃总结前段时间二分区群众运动的经验时就提到，“在中心区虽大部

^① 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2页。

^② 《王光宇、杨元彰、党若平、丁希凌等在路西地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12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871页。

^③ 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40页。

^④ 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主要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2页。

^⑤ 《王光宇、杨元彰、党若平、丁希凌等在路西地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12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871页。

^⑥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75页。

^⑦ 姜廷斌：《一条半枪闹革命》，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64页。

^⑧ 参阅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主要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3页。



分减过租,群众也迫切地要求减租,但毫无依赖的,真正自觉自动去减的还是少数。例如老百姓看到别庄减了,自己不敢去减,而希望工作队来替他们减,对不减的人,群众自己办法不多,总希望政府把他押起来”,总的来说,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都还停留在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打先锋的阶段,而不是广大群众争先恐后的行动,在日常工作上也还只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忙来忙去”。^①

为什么佃户在减租减息上依赖性强,等待观望不积极呢?

一方面,中共政权不是很稳固,减租减息成本无法预期。在二分区,敌、伪、国民党顽固派、中共等多种力量交织,中共政权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并不是永久和长期的。而1941年在国共冲突中,中共力量一度基本退出了该区域。在此情况下,佃户必然会考虑到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积极主动的成本问题。另一方面,农民也受人情、道德观念的束缚。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之上,讲究和谐相处。佃户对于地主的剥削认识不深,认为地主是勤劳、有头脑。佃户还有很强的迷信观念,认为富贵在天。这些观念束缚了减租减息运动的进行。

针对佃户在减租减息上依赖性强,等待观望不积极,二分区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推动减租减息运动。这些办法有:1. 向群众展示中共的实力。如1945年4月,雪商亳县亳二区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县总队副队长谭勋把分给我们的地雷摆在桌子上亮相,使群众大开眼界,纷纷传言:新四军部队多的很,有很厉害的炮,能打多远多远,还有能炸死几百敌人的地雷”。6月初,亳二区在董六庄召开民兵大会。民兵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会场,有的背着枪支、地雷、手榴弹,有的扛着大刀、长矛,还有的扛着铁叉和抓钩。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区队走在前面,民兵走在后面,浩浩荡荡地通过了芦庙等10几个村庄”。^② 2. 耐心、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发动佃户斗争涡永地区的大地主刘治舜。刘治舜,有地18顷,有人有势,住在日伪和中共控制区的连接部,和日伪、国民党顽固派都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佃户非常害怕刘治舜,不敢与工作队队员接近。于是,工作队“象[像]三顾茅庐似的,一趟一趟去找佃户,对一切冷淡躲避的情形都加以忍耐,而且舌敝唇焦的[地]去做说服工作”。3. 利用有些农民贪图小利的心理,打开局面。在宿怀的某区域,地主集体退了租,佃户们把这部分粮食存放在某佃户家中,准备在工作队队员走后,再把退的租粮给地主。针对这种情况,一开始工作队队员采取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但他们还是不敢动用。此时这家佃户要炸油条,但没有麦子,“工作队同志抓住这个好机会,对他们把退租的麦子用了一斗。于是僵局打破了,粮食动用了头,接着就召开佃户会议进行鼓动,于是大家把粮分用了”。4. 利用佃户家庭成员对减租减息的不同态度,进行说服工作。比如某对佃户父子在把租粮退还给地主问题上态度不一,儿子坚持退,父亲不大同意。工作队“就利用其父子兄弟间的心理矛盾,加以说服启发”,“接着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了他们的信心和勇气,结果竟发动了一次胜利的斗争”。^③

第三,干部缺乏和其他工作的牵制,限制了减租减息运动普遍深入的展开。

新四军四师西进,随军的主要是军事干部,地方民政干部缺乏,这种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1944年9月,彭雪枫、邓子恢向淮北区党委和行署报告说:干部稀缺,“公安机关因无干部尚未建立”,“地委因只有何启光一人,不能建立机关”,宿县县政府仅李时庄一人,县委无人负责,“无公安干部、财经干部、地方武装干部、敌工干部”。“各个县区多半仅一个区长、区委书记,

^① 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主要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1页。

^② 姜延斌:《一条半枪闹革命》,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65页。

^③ 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主要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5—966页。

又要照顾武装,真是忙不过来”。^① 各县的情况也不乐观,在夏邑县,“县只有一个财粮科长,一个会计,三个光杆区长”。^② 在永城县,“县府有县长、副县长、秘书共三人”^③,干部缺乏,可见一斑。

同时二分区为新恢复区,工作千头万绪,牵制了减租减息工作。1945年5月20日,吴芝圃在总结前段时间的二分区群众工作经验教训时认为:群众运动没能很好地发动起来,原因之一便是政权工作、财经工作、对敌斗争等工作太多,不能集中力量。^④

第四,干部思想不统一,各部门间的配合不够也是这段时期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深入开展的原因之一。

干部的思想分歧主要有:1. 二分区的工作中心。早在1944年12月,二地委就确定了在二分区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对此,干部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些人强调某些地区环境动荡,应以对敌斗争和统战工作为主,对发动群众表示怀疑”。2. 减租方式。“有的同志希望和平减租,以为不必撕破脸,不必斗,有的则坚持主张斗争”。^⑤ 干部的认识分歧阻碍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开展。

另外,各部门间的配合不够。“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甚至县、区政府对群众工作的配合都缺乏主动性,没有多大帮助。有些同志竟把群众工作认为是部门工作,而不知是全党的任务”。^⑥

总之,在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二分区从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主要是据点式减租减息,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深入和普遍开展。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5月20日,二地委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布置夏收工作。会议上,吴芝圃对二分区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于接下来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发动群众,吴芝圃提出了八条要注意的问题。分别是:1. 要调查研究,占有材料。2. 打通思想,使群众自愿自动。3. 骨干要和积极分子结合,积极分子要和群众结合。4. 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方式。5. 发挥群众集体有组织的力量。6. 创造典型的例子轰动全局。7. 总结群众经验,提高群众,用具体生动的例子教育群众。8. 培养群众自己拥戴的领袖。^⑦

这次会议通过了《淮北二分区夏收群众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普遍实行减租”,并对包租制、分租制下的减租作了详细的规定,要点如下:

1. 包租制。“一律实行二五减租法令(即一百斤减去二十五斤)”。

2. 分租制。“过去对半分者改为三五、六五分(即收粮百斤,地主分三十五,佃户分六十五斤),过去四六分者改为三七分”。^⑧

① 《彭雪枫、邓子恢关于萧宿永夏地方工作情况向淮北区党委、行署的报告》(1944年9月4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751页。

② 《地方工作会议记录》(1944年12月11日),《夏邑县党史文献资料选编民主革命时期》,第54页。

③ 《王光宇、杨元彰、党若平、丁希凌等在路西地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12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867页。

④ 参阅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3页。

⑤ 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3页。

⑥ 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4页。

⑦ 参阅吴芝圃《路西群众运动的程度和主要经验教训》(1945年5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67—971页。

⑧ 《淮北二分区夏收群众工作的决议》(1945年5月20日夏收群众工作会议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973—974页。



二分区群众夏收工作会议后不久,雪商亳县委5月在鲁菜园召开区委书记和乡村干部大会,贯彻二地委关于布置夏收的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召开了控诉玉皇阁村地主徐慕臣大会。

徐慕臣,玉皇阁村人,有地170余亩,其父为前清秀才,徐本人依仗权势,勾结国民党顽固派、伪军、土匪,欺压百姓,鱼肉乡邻,奸淫妇女,为地方一霸。^①

在对徐慕臣斗争时,“有10余户苦主相继登台清算徐慕臣的罪行,徐低头认罪,并表示会后立即兑现(指减租减息——引者注)”。^②这次大会后,雪商亳县“商三区又组织控诉了何寨地主何汝秀、何汝堂等”。^③之后减租减息运动在雪商亳县普遍展开。

三、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成效与不足

(一)减租减息运动的成效

第一,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佃户负担,初步改善了民生。到1945年3月,二分区“已经减租一百六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四斤,从经济利益上算,可以解决将近十万人一个月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④

第二,在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工作的基础上,中共党政军民力量得到了发展。

党的力量发展方面,到1945年3月,二分区“有了九百二十六个党员”。^⑤5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党员总数有三千零七十人,在群众运动中发展的占二千五百人左右”。^⑥

政权方面,政权得到了改造。截至1945年5月,二分区“部分地改造了基层政权,如雪枫、萧县、涡雪、宿蒙等县都有比较大的成绩”。^⑦

军事力量发展方面,到1945年5月,二分区民兵发展到“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人”。^⑧截至同年夏,仅雪商亳、雪枫、宿西、萧县、夏邑五县的民兵就发展到17737人,并且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⑨

群众组织发展方面,农救会、工会等组织都发展起来。

首先是组织农民,建立了各级农救会。截至1945年3月,二分区总体上已经组织了全区1/20的群众。^⑩到5月,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农救会在基层普遍建立起来,“有二十三个区已经建立农救组织,有一百六十六个乡农救会,九百七

① 参阅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11页。

② 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9—40页。

③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11页。

④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56页。吴芝圃在1945年5月20日讲话中说是1643244斤,比3月20日时的讲话少了10斤。

⑤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58页。

⑥ 吴芝圃:《在淮北路西夏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45页。

⑦ 吴芝圃:《在淮北路西夏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45页。

⑧ 吴芝圃:《在淮北路西夏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45页。

⑨ 《雪商亳、雪枫等五县双减增资及群众团体等情况统计》(1945年夏),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72页。

⑩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57页。

十九个保农救会”。保一级的农救会也“发展的比较普遍”。^①

其次,部分地区还在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中建立了工会、妇救会、儿救会组织。截至1945年夏,雪商亳、雪枫、宿西、萧县、夏邑五县,发展工会会员4030人。萧县的妇救会会员达11832人,儿救会会员达3380人^②。

第三,在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中,干部积累了群众运动工作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干部积累的经验主要有:1. 减租(包括减息增资)是发动群众的中心口号。2. 要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打通思想工作。3. 建立农救会方面的经验。农救会的成立要建立在发动减租斗争后,而不能拉夫式地组织农救会;农救会的骨干应该是佃户;要有计划、有意识地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4. 要采取集体减租,由点到面的方法。^③

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45年3月,二分区“共培养了一千五百一十四个积极分子”。他们“成为乡、保级的干部或准备乡、保级的干部。这批将近两千从贫困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同志,是我们推动工作的主力军,是建设这地区的最宝贵的资本”。^④

(二) 减租减息运动的不足

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亦存在不足,主要是在运动的初期。

第一,虽然注重保障群众的经济利益,但在孤立地主上工作不足,且有弄错斗争对象的情况。“发动群众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农村中获得政治优势”。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有计划的(地)削弱顽固地主的统治威严,在群众中使地主孤立,并使最顽固的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孤立起来,作得不够普遍。”同时在群众运动中,“应该打击的地主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但不一定需要进行刺激斗争的地主却被斗了”。^⑤

第二,减租减息中对农民自觉性的启发不够,有包办代替、命令主义倾向。

在减租减息中包办代替的表现之一就是干部和地主直接交涉。“工作队的干部带着群众去减租,打头一炮,自己向地主直接交涉的很多”。^⑥在二分区减租减息初期,当时地主势力仍旧保持,部分农民妥协不说实话,工作队“逼着农民去硬减,或者抛头露面自己斗一下”,并且提出:“地主不减粮食充公”^⑦的口号。

四、余论

对小区域具体问题的研究其实是解剖麻雀的过程,其最大的学术意义或在于通过宏观研究所

^① 吴芝圃:《在淮北路西夏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45页。

^② 《雪商亳、雪枫等五县双减增资及群众团体等情况统计》(1945年夏),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71页。

^③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58—160页。

^④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57、174页。

^⑤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63页。

^⑥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64页。

^⑦ 赵敏:《涡永县曹市乡四里、本集两保十天的群众运动》(1945年2月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41页。



不具备的微观深入,发现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追问特殊性的原因,这样更加丰富我们对某些结论的多元化认识。对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的研究意义同样如此。通过上文的梳理分析,还原了一年多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大致轮廓,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

其一,中共政策提出和政策执行并不完全同步,存在时间差,似不能依据文件内容来划分历史阶段。关于二分区减租减息的阶段划分,有论者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春节前,是减租减息的重点示范阶段;1945年春节后到1945年夏季是减租减息全面铺开阶段;1945年夏到同年秋是减租减息的查漏补退阶段。^①但是仔细考察二分区的减租减息运动,我们会发现,这种描述和实际情况多有不符。

1944年12月前,二分区的减租减息总体还停留在宣传号召阶段,真正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是到12月后。

第一,1944年9月4日,新四军四师主力部队刚过路西,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曾向淮北区党委并行署报告:“到九月下旬及十月初,正植〔值〕秋季收割的时期,打算即在此时具体颁布减租减息法令。”^②

第二,12月份二地委召开二分区工作会议。夏邑县县委书记杨元璋在12月11日的汇报发言中说:“减租布告还未出,减租减息条例已草就。”^③这个时候,夏邑县减租布告不仅没有出,而且减租减息条例只是草就,所以很难说12月前,二分区开展了较大的减租减息运动。

“1945年春节过后,风起云涌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到第二阶段——全面铺开阶段”。^④这个判断或主要是建立在对政策的梳理上。1944年12月7日,淮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路西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二分区群众运动的“中心是减租减息增资”。^⑤12月11—18日,二地委在蒙城县北马圩子村召开二分区群众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把群众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在群众工作中,“以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为中心”。^⑥1945年3月20日,二地委群众工作会议上,吴芝圃提出减租工作还要更加深入,“必须以普遍减租,即减的地区要补漏洞,未减的地区要广泛减”。^⑦

虽然政策如此,但是1945年春节后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全面铺开阶段”的判断^⑧和事实多有不符。

第一,减租减息主体——佃户在这个阶段的减租减息中多有依赖,没有形成群众的自觉。减租减息除了是经济上的斗争外,同时需要唤起群众的阶级觉悟。1945年5月20日,吴芝圃在夏收群众工作会议上总结前一段时间的减租减息时说:群众“一般说胆量还不够大,顾虑很多,还有依赖性,在会议上他们还是战战兢兢,看政府的颜色,看工作队的颜色。在中心区大部分减过租,群众也迫切要求减租,但毫无依赖的,真正自觉自动去减的还是少数”。^⑨

① 参阅杨成文、李克影《略述淮北二地委减租减息运动》,《党史纵览》2000年第3期。

② 《关于肖永夏地方工作情况报告》(1944年9月4日),《夏邑县党史文献资料选编 民主革命时期》,出版信息不详,第82页。

③ 《地方工作会议记录》(1944年12月11日),《夏邑县党史文献资料选编 民主革命时期》,第56页。

④ 杨成文、李克影:《略述淮北二地委的减租减息运动》,《党史纵览》2000年第3期。

⑤ 《淮北苏皖豫边区党委关于开展路西群众工作的指示》(1944年12月7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12页。

⑥ 乔正德:《雪商亳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丁希凌、冯登紫编著:《雪商亳县的战斗历程》,第306页。

⑦ 吴芝圃:《路西半年群众工作——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3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175页。

⑧ 杨成文、李克影:《略述淮北二地委的减租减息运动》,《党史纵览》2000年第3期。

⑨ 吴芝圃:《在淮北路西夏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47页。

第二,减租减息中出现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即“在群众中间退了租不敢用,或者偷偷送回给地主也屡有发现”。^①这说明,在前段时期的减租减息中出现了假减的情况。

第三,在1945年5月20日二分区通过的《关于夏收群众工作的决议》中“夏收群众工作斗争纲领”部分,第一条就是普遍实行减租。^②这意味着前一期减租尚未普遍开展,或者说尚未“全面铺开”。

第四,从事后的调查报告反映来看,二分区在1945年夏季以前没有普遍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5年11月,二分区已调整为华中八分区,华中八地委宣传部部长江枫对雪枫县苗桥区做了调查。调查报告说:“年前(指1945年——引者注)的群众运动是形式的,春间实行减陈租,组织了群众的集体借粮”,并且是“在午季,实行了以村为单位的集体减租”。^③

其二,佃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不积极主动,原因何在?有论者在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时认为:“农民不积极则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④但笔者以为:作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下辖区域之一,二分区的情况或有别如此。造成佃户不积极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共政权的不稳固。在政权建立的初期,虽然淮北区党委和二地委都要求把减租减息放在二分区工作的重要位置,在1945年3月的二分区群众工作会议上更是要求普遍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到了同年的6月份,减租减息运动才在二分区较普遍深入的展开。开始佃户的减租减息热情不是很大,不是很积极和主动,当政权巩固,环境稳定后,佃户的减租减息热情就很大了。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中共是怎样让佃户主动起来呢?有论者认为农民不积极主动,“是可以通过说服教育解决的”^⑤,还有论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佃户的阶级觉悟以及组织他们,佃户的疑虑和担忧就减少了。^⑥无疑后者的解释更加稳健,既看到了佃户的认识问题,又看到了组织农民的重要性。

考察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我们会发现,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能有效发动佃户的关键在于中共自身力量的强大和政权的稳固。中共自身力量的强大和环境的稳定,不仅组织农民变得容易,而且发展党政军群组织的力量都变得很有效,减租减息运动自然比较好打开局面。

其三,关于抗战后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不足是我们研究中长期没有注意到的。相较变更地权的土地革命,减租减息运动在各个方面显然更加温和一些。我们研究中,较少关注减租减息运动的不足^⑦,尤其较少关注抗战后期减租减息运动的不足。实际上,减租减息政策在抗战后期更加完备^⑧,但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包办、命令、随意扣押地主等“左”的情况。

[作者杜桂剑、单明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吴芝圃:《在淮北路西夏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47—248页。

② 《淮北二分区关于夏收群众工作的决议》(1945年5月20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内部发行),第233页。

③ 江枫:《雪枫县苗桥区调查》(1945年11月27日),中共商丘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④ 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⑤ 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⑥ 陈廷焯:《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340—341页。

⑦ 学界已经注意到在陕甘宁、华北等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1939—1941年底曾发生过减租减息上的“左”倾。参阅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第374页。

⑧ 参阅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第378页。